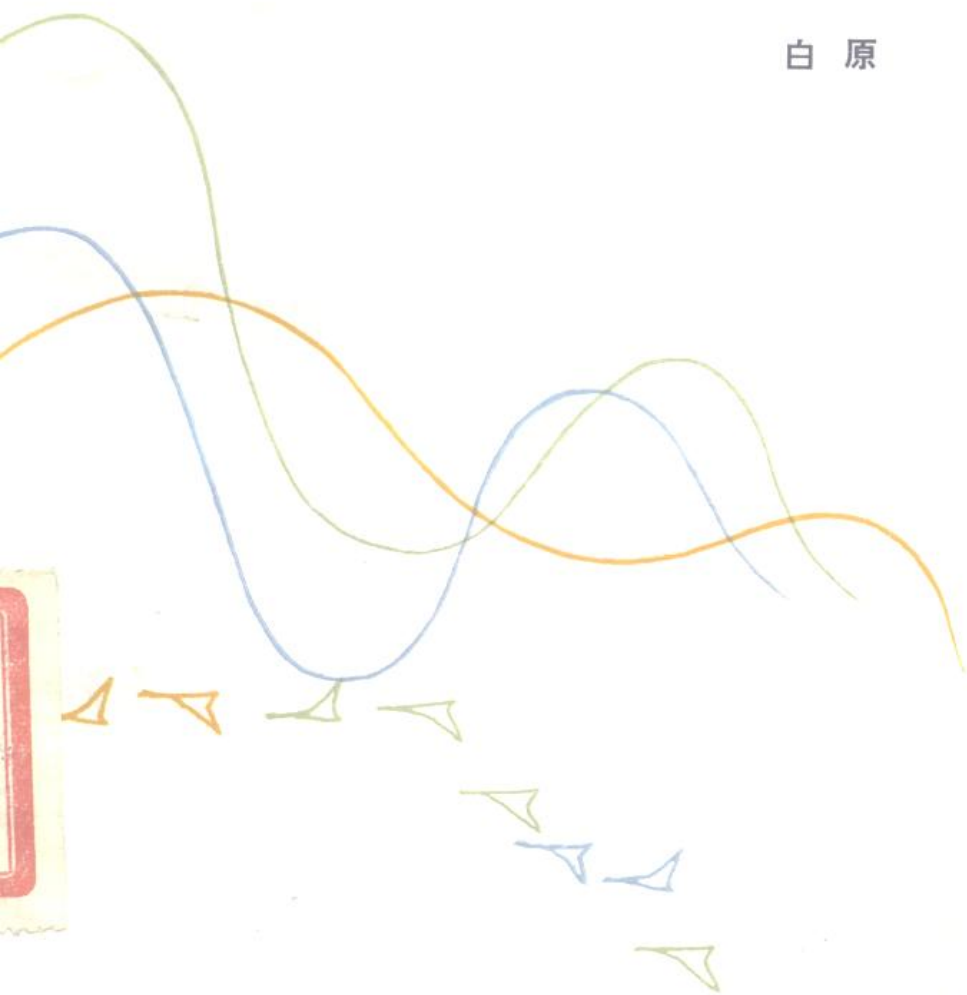


河山纪事

白 原



河山纪事

白 原

新 华 出 版 社

河 山 纪 事

白 原 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插页2张 147,000字

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600册

统一书号, 7203·094 定价, 0.95元

0三
5批

题 辞

壮丽的河山

长江滚滚，翻卷着波浪，
洞庭湖的湖水邀彩云一起荡漾，
阵阵春风吹过辽阔的原野，
云水间回荡着大地建设者的歌声。

上升的月亮驾着波浪过了长江，
对着银镜般的洞庭湖妆饰打扮，
然后伴随那仍在回荡的歌声，
一路凝眸顾盼祖国壮丽的河山。

——白 原

目 录

1	难忘的记者生活（代序）
18	淮河岸上一村庄
24	建设乐园的人们
32	庄稼湖
38	为了幸福的生活
48	洪泽湖边的春光
53	洪泽湖故事
61	在不同的年月里
67	回延安
84	祖国的早晨
89	青春的经历
103	一个女建设者
114	真理的花朵
120	春天的桂林
126	山城百色
130	山村夜话
136	金子的故事

141	渔乡帆影怀海陵
146	花间乐音
151	生命的花朵
156	“三八”饭店
160	金水泉边
165	地狱生还话沧桑
177	蒙古包里
183	北归的雁阵
190	地狱变乐园
196	安代舞的故乡
201	敖尔盖草原
209	革命干部梁万升
216	在鄂尔多斯草原上
223	幸福与理想
228	陈沛当队长
235	后 记

难忘的记者生活（代序）

我衷心热爱记者工作。几十年来，
它在我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中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

第一次采访

一九五〇年春天，我从北京乘京绥路火车到河北怀来县的新保安去，准备采访解放军一个部队在革命胜利后参加生产建设的情况。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也是我在建国以后开始做记者工作第一次从北京到外地去采访。我怀着革命胜利后的一种兴奋的、欢欣鼓舞的心情，坐在火车的普通硬席车厢里，同许多普通乘客坐在一起。在他们当中，有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乘火车到外地去工作的国家干部；有的是在解放以前因为在家乡无法生活，流落在城市里，家乡土地改革以后，家里分到了土地，从北京或者其他城市带着妻子儿女返回家乡定居的农民；有的是在旧社会家人离散，新中国成立以后通了音讯，从北京或者其他地方到家乡或者到其他

地方去与家人重聚的各种各样的人们。火车开动以后，一路上，有的人在一些车站下了车；有的人在一些车站踏上火车到车厢里来。在奔驰的火车上，他们坐在一起互相交谈，互相询问新中国成立以后个人的以及各个地方的情况，交谈着个人今后的打算，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信心和无限的向往。

火车到达怀来县城的时候，在怀来车站上车的乘客当中，有几个参加怀来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农民代表，开完了会乘火车回他们村去。有一个五十多岁的村副主席叫范文明，刚上火车走进车厢里，在他的座位上一坐下，就放开嗓子向坐在他对面和邻座的乘客象演说一样高昂地说起来。原来是因为在县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一个王家楼区的区长在会上说他们区因为闹灾荒，收成不好，使得有些人粮食不够吃，冬天棉衣也没有穿上。范文明因此对王家楼区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对区长在会上的发言提出不同的意见。一直到县人民代表大会开完了，他上火车返回村去的时候，在火车上情绪还十分激动，一遍又一遍激昂地对车上的人们说：“革命胜利了，还有人吃不饱，冬天连棉衣也没有得穿，你这个当区长的，为什么不好好把你们区里领导生产的问题和错误缺点说一说？……”范文明的激昂的嗓子吸引了周围许多乘客，都在听他那滔滔不绝的“演说”。

由于一路在火车上所看到和听到的情况，以及那个村副主席范文明在火车上激昂的“演说”，在奔驰的列车上所反映的全国人民对革命的胜利，对祖国的生产建设，对未来生活

欢欣鼓舞的思想感情，使我深受感动。到了新保安下了火车以后，我立即就把原来并没有打算采访的火车上的情景写了一篇通讯《京绥路上》，当天就寄回报社。报纸发表的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把这篇通讯向全国广播了。那时候范长江同志是《人民日报》的社长，邓拓同志是总编辑。这篇通讯发表以后，他们都对我加以很大的鼓励。这篇通讯之所以受到当时报社两位领导同志的重视，并不是因为它写得怎么好，而是因为革命胜利后在人民群众心中反映的无限热爱新中国的思想和感情。如果现在有人读到它的时候，一定也同我重读到它的时候一样觉得它写得那么粗糙，那么没有文采，只是一篇在匆促中写成的简单通讯报道而已。

至于范长江同志和邓拓同志那时对我的鼓励，那是因为他们在那篇通讯中，看到我不受预先拟定的采访计划的限制，在旅途的火车上采访、报道了那时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感情。

怀念范长江、邓拓同志

当我回顾在记者工作的经历中留下的许多难忘的记忆的时候，不能不深切怀念范长江同志和邓拓同志。作为党的新闻工作的领导者和使我觉得十分亲切的同志，他们对我作过许多热忱的鼓励，而且在工作中常常和我谈起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应有的修养和品德，应当时刻关心并热切注视当前发生的新生事物，不要受任何框框的影响和束缚，同时应以满腔热

情把自己的生命同党、同社会主义的祖国融合在一起。

一九五三年秋天，我在山西采访的时候，因为那时我在农村采访一般都不坐车，所以把走在路上看见的庄稼地里的丰收景象写了一条新闻发回报社。这条新闻发表以后，我回到报社，邓拓同志让我专门到唐山去，在现场上采访、报道工业生产的新闻，做一点新闻改革的尝试。可惜我后来没有能够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从唐山发回报社的新闻没有发表。我写的稿子，有的是因为当时报纸宣传方面的缘故不能发表，有的是因为稿子本身没有写好，邓拓同志把稿子交给我时总叮嘱我把稿子好好保存起来。据我所知，他对一个同志的工作、劳动的尊重和珍惜，不仅对我是这样，对别的同志也是这样。

有一次在工作之余，范长江同志向我谈起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应当具有的品德时对我说：作为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应当无限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祖国，就象战国时的屈原无限热爱他的祖国一样，要有象屈原写离骚时对他所追求的理想和他所热爱的祖国那样一种感情。他一边认真地说着，一边同我开玩笑：“可是你这个白原，可不要结果成了个屈原啊！”那是他用开玩笑的方式借用我的名字，抒发他对历史的感慨（也包含着对我的激励）。没想到写过《中国的西北角》的范长江同志，和同是在新闻事业中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无限热爱，忠心耿耿的邓拓同志，竟如范长江同志所曾抒发的对历史的感慨一样，都在十年浩劫中被“四人帮”迫害去世了。

追求与信念

在革命胜利后我第一次从北京到外地采访的过程中，除了在火车上采访的那篇通讯以外，还采写了一篇《河山序曲》，一篇《人间的春天》，作为一组报道，从几个侧面来反映刚刚获得胜利的中国人民，满怀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思想感情在开始建设新生活的情景。《人间的春天》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臧克家同志于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战斗英雄底形象》的文章中，也曾对我作过鼓励。他在文章中说：“《人间的春天》是华北人民解放军挖渠大生产的报道。《新华月报》把它收到政治之部‘部队生产’里去了，实际上是一篇朴素美丽的散文。那位作者并没有故意用‘文艺笔调’在那里作文章，那只是真切地，实在地记述事实……”臧克家同志是我国的著名诗人。我把他曾经对我所作的鼓励留在我的记者生活的记忆里，因为他的鼓励为我所珍惜，同时也因为可以引用他后面这句话来概括我在长期的记者工作中始终保持的一种追求，一种信念：就是如何努力使自己能真切地、实在地记述、报道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从他们当中产生的新事物。

为了达到我对自己的要求，据我自己在记者工作中的体验，只有深入到广大的群众中去，了解并感受他们的思想感情，因而也才能发现并深切理解从他们当中产生的新事物。所以在革命胜利后的五十年代，我从北京到外地采访时，都

不住省机关或县机关的招待所，同群众一道住在街上的普通旅馆里；从省城或县城到一个地区或乡镇去采访时，天不亮就从旅馆的铺上爬起来赶到汽车站去乘公路的班车。那时候，公路上有座位的班车也不多，大都是没篷的大卡车，同各种各样的乘客一道挤在颠簸的大卡车上。那时候有的公路上连这样的班车也没有，那就索性徒步走。一天走不到目的地时，就在路边的乡村小客店里同赶大车的、做买卖的、拉板车的老乡们挤躺在铺满稻草的地铺上过夜。一路上看到、听到他们生活当中的许许多多事情，为我提供许多在一般情况下看不到、听不到的通讯报道的材料。在我所写的通讯报道中，不少是在采访计划以外，根据路上所获得的材料写成的。

一次难忘的采访

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建立没有多久，各地的交通以及工作和生活的条件都还很艰苦。各机关单位和个人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都还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的老传统。一九五二年冬天，我去河南省临汝县访问一个参加治理淮河建设工程的劳动模范。那时候，公路上不是每天都有客车来往。我从北京乘火车到了许昌，第二天搭老百姓的马拉大车到了禹县城。禹县县委会帮我雇了一头毛驴。骑着毛驴走了一百多里路到了临汝县境内，路上碰上了大风雪，雪下在路上一下子又冻成了冰。毛驴走在冰上常常滑倒起不来，而且风又大，天又冷，毛驴不能骑，只好跟着赶毛驴的老乡在大风雪中一步步往前走。

在临汝县一带，解放以前是土匪出没、民不聊生的地方。在大风雪中沿着曲曲折折的道路走在一片迷迷茫茫的原野上，隔不多远，在一些交叉路口附近，或者是在一些隘路的旁边，就出现一座用坚固的石头筑成的寨子。布满枪眼的炮楼，高高地立在每一座寨子的上头。在从前，这是土豪恶霸盘踞的地方。他们把许多乡村筑成一个个坚固的寨子，各霸一方，互相对垒，并且到处残杀和劫掠。在这一带地方，人们在五十年代初期还保留着解放以前的习惯：没有旅伴，单独走路总怕出什么事，所以总是尽可能找到旅伴同行；如果你单独一个人，在一段僻静的路上碰上三两个赶路的老乡，向他们打听前面的路程，他们在回答过你以后，总要加上一句：“自己人，走吧！”这是从前陌生人在路上碰见的时候常用的一句话，告诉你碰见的不是坏人，叫你放心。

因为风大雪大，天也黑得早，走四五十里地就得停下来在路边的小客店里过夜。同住店的老乡挤在小客店的草铺上，听他们讲述解放以前土匪打家劫舍，残杀人命的悲惨故事，回忆他们亲身经历的各种遭遇以及这一带老百姓生活的情景，谈论解放以后社会的变化和人民生活的景况。虽然我原来并没有打算作这方面的采访，却使我获得许多既真实又生动的通讯报道的材料。后来就用这些材料写了一篇通讯《在不同的年月里》，报道解放前后新旧社会的变化和人民生活的景况。

在大风雪中继续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程，才到了参加治淮的劳动模范傅天佑所在的谢湾村。那是一个在山根根上的小村庄。高高的山峦从两旁把村子夹在下面，散布在高山坡上

的是一块块贫瘠的土地。已经六十岁的傅天佑，解放前是个苦了一辈子的老贫农。土地改革的时候，他家分到了房和地，但是解放还没有多久，生产建设还没有发展起来，生活还很艰苦。当我冒着大风雪来到他家的时候，看到屋里的墙上挂着许多晾干的红薯叶。因为冬天粮食不够吃，就用晾干的红薯叶同玉米、小米煮成稀饭来补充一部分粮食。我在他家里同他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为了招待我，他特地擀些面片加在红薯叶同玉米、小米煮的稀饭里，可是吃起来还是一样带着苦味。夜里同他睡在一个土炕上，听他向我诉说旧社会的苦难和解放后的生活。

他对我说，家乡解放那一年，有个冯队长带着一支队伍路过谢湾村，在村里跟大伙说：“我们到这里来，是带着两把镢头来的。地主老财说，穷有穷根，富有富根。我们这两把镢头，一把要把地主老财的富根挖掉，一把要把咱们的穷根挖掉。从今以后，要把新的根苗栽起来。”

家乡解放以后，过了没有多久，人民政府号召人民参加治理淮河的消息来到谢湾村，傅天佑就到村长那里去报名。因为他年纪大，村长没有批准。他又跑到区长那里去，向区政府要求报名去治淮。区长劝他不要去，怕他身体吃不消。可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非要去不行。最后区政府只好批准了他。

傅天佑和村里参加治淮的人们一起，随着县里的治淮大队到了治淮工地上。刚到工地那一天，傅天佑他们还没有上工。傍晚，他和本村参加治淮的几个人站在工棚外面往工地

上望着。遍野的人群日夜不息地在开凿隧洞，运输工程的物资和器材，建筑堤岸，开挖河道……天空上震荡着一阵阵爆炸的巨响，在那壁立的悬崖上，闪耀着一朵朵爆炸的火光。夜里，在无数闪动的电灯光照耀下，从工地的播音筒里放送着嘹亮的歌声。人群在大地的海洋里翻卷着波浪……这时候，傅天佑突然想起那个冯队长所说的话来。一直到这时候，他才完全明白了那些话的全部含意，并且亲眼看见了新的根苗怎样在栽起来，使他对祖国的建设和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决心和希望。

到了冬天，治淮土地开始冰冻以后停了工。傅天佑在治淮工程停工以后，和本村参加治淮的人们一同回到谢湾村。在治淮工程的宏伟建设鼓舞下，他把村里参加治淮的人们找到一起，制订了一个建设家乡的水利计划。经过区政府的批准，把村里的人们组织起来，经过一冬一春的艰苦劳动，在山上凿通十六个大大小小的山洞，筑起一道道土坝，把一座座几十丈高的山崖连接起来，把山下的河水引到山上灌溉二千三百多亩干旱的土地。

接着，治淮工程开工以后，傅天佑又和大伙到了治淮工地上。在治淮工地干了没有多久，他们参加建设的一个工程也全部完工了。

在几十年极度贫困的生活里，由于风沙的吹打和灶火的烟熏，到了老年，傅天佑的双眼一见风或者感情激动时就淌眼泪。在我要走的那天，雪已经不下了，但风还没有停。他从家里送了我老远还不肯转回去。我对他说以后还要再来。

最后，他用双手拉着我的手淌着眼泪对我说：“你可不要哄我。下回你来的时候，咱们的饭里就再也不用掺红薯叶了……”

傅天佑的生活经历和真挚的思想感情使我感动，也使我受到深深的教育。访问傅天佑以后，我写了一篇通讯《为了幸福的生活》。岁月流逝已经过了差不多三十年。我一直没有忘记傅天佑，也没有忘记那一次采访的经历。

还没有记者去过的地方

在新中国成立还不太久的五十年代，有的边远地方剿匪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有的偏僻山区有时还有零星土匪骚扰。我在广西采访的时候，《广西日报》的同志打算给我配备一支短枪带在身上到乡下去（那时《广西日报》有的记者下乡采访时就带支短枪），可是有的同志不主张我带，因为我对地方的情况不熟悉，一个人带着支枪，万一被坏人发现了反而容易出事，所以最后还是没有带。那一次，我从桂林去广西东北边同湖南、贵州接壤的少数民族地区采访。那个地区除了一部分汉族人以外，共有壮、瑶、侗、苗、黎、回、伶七个民族，都居住在山峦重叠的大深山里。那是我一辈子从来没有爬过的那么高、那么陡的山。山上有的地方，还没有到山顶就覆盖在云层里。那时正是三月间，南方这时的天气，从山下穿着单衣上山时还出汗，可是爬到山上的云层里以后，云层化成的霏霏冷雨夹着飕飕的寒风，使人冷得发

抖。在许多陡峭的地方，要用手攀着脚前的山石或藤蔓才能爬上去，就象是用四只脚爬着一步一步往上走。那个地方的县和乡镇的干部说，新中国成立后，还没有报社的记者去过那里采访。

我在那个地区采访告一段落，就从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一个小镇回桂林去。小镇上没有公路班车。我用根绳子把手提的帆布旅行包捆着背在肩上，一清早就从镇上沿着一条大路往前走。这一路上虽然没有那么陡的山要攀登了，但仍然是一座大山连着一座大山。那一天走了五六十里路到了一个村边上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一些同路的乡人们都停下来到路边的一个小客店去过夜了。因为那天天气好，天色还不晚，还有三十里路就是区政府所在的一个大镇子，估计天黑以前可以赶得到，于是我决定继续往前走。可是没想到走到距区政府所在的那个镇子还有十几里路的地方，还要爬上一座大山，黄昏的山色愈来愈暗，山上已看不到一个行人，爬到半山的林丛里天就黑了。一个人在黑天里走在这样的大山路上，如果碰到什么坏人，的确一点办法也没有，心里实在紧张，肩上背着旅行包也愈来愈重，只好带着满身汗水拚命往前赶，到了山顶上，才看到山下的镇上亮着一片灯光。我这才松下心来，在路边一块山石上坐下来歇了好一会，才又沿着曲曲弯弯的山路下了山。

在镇上找到区政府，干部都下班了。一个工作人员看了我递给他的介绍信，找了一间小空房让我住下，一转眼那个工作人员也找不着了。我跑到区政府的食堂去看看还有没有